

原文：Torres, É.P. (2022). *Understanding 'longtermism': Why this suddenly influential philosophy is so toxic*. [online] Salon. Available at: <https://www.salon.com/2022/08/20/understanding-longtermism-why-this-suddenly-influential-philosophy-is-so/> [Accessed 4 Sep. 2022].

作者：爱弥儿·P·托雷斯 (Émile P. Torres) (they/them)

译者：許顛頊 (they/she)

了解“长期主义”：为什么这个突然很有影响力的哲学是如此有毒

Understanding 'longtermism': Why this suddenly influential philosophy is so toxic

无论我们可能“亏欠未来什么/对未来负有什么责任”什么，它都不是一种由优生学和资本主义推动的怪异而危险的意识形态 (Whatever we may "owe the future," it isn't a bizarre and dangerous ideology fueled by eugenics and capitalism)

也许你已经在你的社交媒体动态上看到了“长期主义 (longtermism)”这个词。或者你偶然发现了《纽约客》 (the New Yorker) 对威廉·麦卡斯基 (William MacAskill) 的介绍 (profile)，他是长期主义的公众形象。或者读了麦卡斯基最近在《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上发表的评论文章 (opinion essay)。或者看到《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in TIME magazine)：《如何做更多好事》 (“How to Do More Good”)。或者注意到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转推了麦卡斯基的新书《我们对未来的责任》 (“What We Owe the Future”) 的链接，并评论说：“值得一读。这与我的哲学很相近。”

正如我之前所写的，长期主义可以说是最有影响力且一般公众很少听说过的意识形态。长期主义者直接影响了联合国秘书长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的报告；一位长期主义者 (longtermist) 目前正在管理 (running) 兰德智库公司 (RAND

Corporation)；它们得到像马斯克这样的亿万富翁的重视 (have the ears of billionaires like Musk)；而所谓的有效利他主义社群 (Effective Altruism community)，即产生了长期主义意识形态的社群，拥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461亿美元的承诺资金 (committed funding)。长期主义在幕后无处不在——它在科技业 (the tech sector) 拥有大量的追随者——而且这种观点的拥护者越来越多地在幕后操纵着 (pulling the strings) 主要的世界各国政府和商业精英们 (major world governments and the business elite)。

但什么是长期主义？我已经在其它文章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将在今后的文章中继续这样做。在这里简单描述一下就够了：长期主义是一种类宗教世界观 (quasi-religious worldview)，受到超人类主义和功利主义伦理 (transhumanism and utilitarian ethics) 的影响，它主张在数百万或数十亿年后的未来，可能会有如此多的数字人 (digital people) 生活在庞大的计算机模拟 (vast computer simulations) 中，以至于我们今天最重要的道德义务 (moral obligations) 之一就是采取行动来确保这些数字人尽可能多地出现 (come into existence)。

在实践意义上说，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努力生存足够长时间，以便殖民太空，将行星转换成巨大的计算机模拟，并创造出数量深不可测的模拟人 (simulated beings)。能有多少模拟人呢？根据尼克·波斯特罗姆 (Nick Bostrom) ——长期主义之父和人类未来研究所的主任 (director of the 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 ——未来可能至少有 10^{58} 个数字人，或者1后面跟着58个零。其它人也提出了类似的估计，尽管正如波斯特罗姆在2003年所写的那样，“重要的.....不是确切的数字，而是它们是庞大的这一事实”。

然而，在这篇文章中，我不想把重点放在这种意识形态是多么的怪异和危险，以及能是多么的怪异和危险。相反，我认为察看从长期主义中出现的社群会是有用的，重点是几

个人的想法，TA们帮助塑造了麦卡斯基和其它人现在正在大力推动的世界观。最明显的起始点便是博斯特罗姆，他在21世纪初的出版物——比如他的论文《天体废物》

（“Astronomical Waste”），最近被马斯克转推——为此播下了种子，而这些种子已经成长为爬满（crawling over）科技业、世界各国政府以及《纽约时报》和《时代》等主流媒体的葛藤（the kudzu vine）。

首先，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是21世纪迄今为止最突出的超人类主义者（most prominent transhumanists）之一。超人类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其认为人类（humanity）是一项正在进程中的工作/一种半成品（a work in progress），是我们应该积极重新改造（reengineer）的东西，使用先进技术，如大脑植入物（brain implants），其可以将我们的大脑连接到互联网，以及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可以使我们创造超级聪明的设计婴儿（super-smart designer babies）。我们也可能通过生命延长技术（life-extension technologies）获得永生，并且，事实上，许多超人类主义者已经与阿尔科组织（Alcor）签约，在TA们死后将TA们的身体（或只是TA们的头和脖子，这更便宜）冷冻起来，以便TA们以后可以复活（revived），在一个这一做法有可能的假设性未来（a hypothetical future）。博斯特罗姆本人在脚踝上戴着一个金属扣，上面写着阿尔科的指示，即在他死后“代为保管（take custody）他的身体并将其保存在一个充斥着液氮的巨大钢瓶中”。

在与他在人类未来研究所的同事卡尔·舒尔曼（Carl Shulman）共同撰写的一篇论文中，博斯特罗姆探讨了通过对胚胎进行“理想（desirable）”特征的基因筛选（genetically screening），摧毁掉那些缺乏这些特征的胚胎，然后从干细胞（stem cells）生长培育新的胚胎（growing new embryos），一次又一次地建造（engineering）具有超高智商的人类

(human beings with super-high IQs) 的可能性。他们发现，通过从10个胚胎中选择一个，从被选择的胚胎中再创造10个胚胎，然后重复这个过程10次，科学家可以创造出一个从根本上增强的人 (a radically enhanced person)，其智商最高可提高130点 (with IQ gains of up to 130 points)。

尼克·博斯特罗姆探讨了，通过对胚胎进行“理想”特征的基因筛选，摧毁那些缺乏这些特征的胚胎，然后用干细胞培育生长新的胚胎，从而建造“从根本上彻底增强的”人类，的可能性 (the possibility of engineering "radically enhanced" human beings)。

这个被设计建造的人 (this engineered person) 可能与我们如此不同——如此般更为聪明——以至于我们会把TA (them) 归类为是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物种：一个后人类 (posthuman)。根据博斯特罗姆2020年的《来自乌托邦的信》 (“Letter From Utopia”)，后人类 (posthumanity) 可能开辟 (usher in) 一个技术乌托邦般的天堂 (a techno-utopian paradise)，其特点是超出我们最疯狂的想象的奇观和幸福 (wonders and happiness)。在提到乌托邦所可能存在的愉悦 (the amount of pleasure) 时，写这封信的虚构的后人类 (the fictional posthuman) 宣称：“在乌托邦，我们有巨大筒仓般的愉悦 (immense silos of it)。其充斥着 (pervade) 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将其洒 (sprinkle) 在我们的茶里”。

长期主义世界观的核心是博斯特罗姆在2002年提出的存在风险这一概念 (the idea of *existential risk*)。他最初将其定义为任何会阻止我们创造后人类文明 (a posthuman

civilization) 的事件，尽管一年后他暗示，它也包括任何会阻止我们殖民太空和在巨型计算机模拟中模拟大量人口的事件（这是马斯克转推的文章）。

最近，博斯特罗姆将这个术语重新定义为任何会阻止人类（humanity）达到他所称的“技术成熟（technological maturity）”的东西，或者说一个我们已经完全征服了自然世界，并将经济生产力最大化到极限的境况（a condition）——这是终极的培根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炽热之梦（the ultimate Baconian and capitalist fever-dreams）。

对于长期主义者来说，没有什么比屈服于存在风险更糟糕的了：这将是终极悲剧，因为它将使我们无法掠夺（plundering）我们的“宇宙禀赋（cosmic endowment）”——像恒星（stars）、行星（planets）、小行星（asteroids）和能源（energy）这样的资源——许多长期主义者认为这是实现我们在宇宙中的“长期潜力（longterm potential）”不可或缺的步伐（integral）。

什么样的灾难会实现（instantiate）存在风险？显而易见的是核战争、全球大流行病（global pandemics）和失控的气候变化（runaway climate change）。但博斯特罗姆也严肃对待对待这样一个观点，即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随时可能被关闭的计算机模拟中（马斯克似乎从博斯特罗姆那里得到的又一个想法）。博斯特罗姆进一步将“劣生压力（dysgenic pressures）”列为一种存在风险，即，“智力天赋（intellectually talented）”较低的人（那些有着“低智商”的人）人数会超产（outbreed）有着超群智力的人（people with superior intellects）。

当然，这是直接从优生学手册（the handbook of eugenics）中出来的东西，这点应该不令人惊讶的：“超人类主义”一词是由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在20世纪所推广普及的（popularized），他在1959年至1962年期间是英国优生学协会的主席（the president of the

British Eugenics Society)。换句话说，超人类主义是优生学的孩子（the child of eugenics），是我们应该利用科学和技术来改善“人类储备（human stock）”这一信念的更新版本。

从这一点上应该很清楚，为什么“人类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让我脊背发凉（sends a shiver up my spine）。这个研究所不是只关注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它倡导一种非常特殊的世界观——长期主义世界观——它希望通过影响世界各国政府和科技亿万富翁们（tech billionaires）来实现这一目标。在这一点上，它的努力正在得到回报。

罗宾·汉森（**Robin Hanson**），与威廉·麦卡斯基一样，是人类未来研究所的“研究助理（research associate）”。他也是一个“男权（men's rights）”倡导者，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参与到超人类主义中。在2008年，他为，与博斯特罗姆共同编辑的，《全球灾难性风险》（“Global Catastrophic Risks”）一书的供稿中，他认为，如果工业文明（industrial civilization）将要崩溃，为了重建它，我们可能需要“追溯我们人类祖先的成长道路”，从狩猎-采集阶段（a hunter-gatherer）进行到农业阶段（an agricultural phase），最终达到我们目前的工业状态（current industrial state）。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建议，一种方法是创建避难所（refuges）——例如，地下掩体（underground bunkers）——不断地储备人类（stocked with humans）。但不是任何人类都可以：如果我们最终再次进入前工业化阶段（a pre-industrial phase），

在一个避难所[或掩体]里储备（stock）真正的狩猎-采集者和自给自足的农民（real hunter-gatherers and subsistence farmers），以及TA们认为有用的工具，可能是有意义的。当然，这些人需要有足够的纪律性（be disciplined enough），在避难所里平静地等待，直到其出现的时机成熟（the time to emerge was right）。也许这样的人可以从

一个受到良好保护的地区（a well-protected region）定期轮换过来（be rotated periodically），在那里TA们实行简单的生活方式，这样TA们可以保持TA们的技能常新（keep their skills fresh）。

换句话说，汉森的计划是把一些当代的狩猎-采集者——其人口已经被工业文明大幅摧毁下降（decimated）——塞进掩体，并带着在我们的文明崩溃时重建工业文明的指示。正如奥德拉·米切尔（Audra Mitchell）和阿迪塔·乔杜里（Aadita Chaudhury）所写的，这是“白人占有欲逻辑（white possessive logic）的一种惊人展示”。

罗宾·汉森的大计划是把当代狩猎-采集文化中的人塞进地下掩体，并带着在我们的文明崩溃时重建工业文明的指示。

最近，汉森陷入了争议，因为他似乎主张，按照“收入再分配（income redistribution）”的方式进行“性事再分配”（seemed to advocate for “sex redistribution”），在此之前，一名自我认为是“非自愿单身者”的人（a self-identified “incel”）实行了一场国内恐怖袭击（a domestic terrorist attack）。这导致《石板杂志》（Slate）怀疑汉森是否是“美国最怪异令人毛骨悚然的经济学家（creepiest economist in America）”。汉森不负众望，更加倍肯定地（doubled down），为《石板杂志》的文章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经济学是，而且应该是，怪异令人毛骨悚然的》（“Why Economics Is, and Should Be, Creepy”）的回应。但这并不是汉森写过或说过的最骇人听闻（appalling）的事情。想想他几年前发表的另一篇题为《温柔无声的强奸》（“Gentle Silent Rape”）的博文，它和听起来的一样令人恐怖（horrifying）。或者，奖项应该授予他令人震惊的断言，即

大屠杀的“主要问题”是没有足够的纳粹分子！毕竟，如果有六万亿纳粹分子（six trillion Nazis）愿意每人支付一美元来实现大屠杀，而只有六百万犹太人愿意每人支

付十万美元来防止大屠杀，大屠杀就会产生价值5.4万亿美元的消费盈余（\$5.4 trillion worth of consumers surplus）[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在与汉森的辩论中引用了这段话]

尼克·贝克斯特德（**Nick Beckstead**），与麦卡斯基和汉森一样，是人类未来研究所的另一位研究助理。他也是FTX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the CEO of the FTX Foundation），该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来自加密货币亿万富翁山姆·班克曼-弗里德（the crypto-billionaire Sam Bankman-Fried）。此前，贝克斯特德是开放慈善组织（Open Philanthropy）的项目官员（a program officer），该组织在2016年给了汉森 290345 美元，“用于分析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的潜在情景”。

与博斯特罗姆一样，贝克斯特德被认为是长期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因为他在2013年发表了题为《论形塑遥远未来的压倒式重要性》（“On the Overwhelming Importance of Shaping the Far Future”）的博士论文，长期主义者托比·奥德（Toby Ord）对此将其描述为“关于存在风险的最佳文本之一。”贝克斯特德在其中提出，在当前，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是我们的行动将如何在即将到来的“几百万、几十亿和几万亿年”里影响未来。我们如何管理做到这一点？一种方法是确保没有发生任何——可以阻止我们在天堂中的“广阔和光荣（vast and glorious）”的未来，其中有数万亿模拟人生活在虚拟现实——的存在风险。另一种方式，是找出能改变文明发展轨迹的各种方法：即使是微小的变化也会产生涟漪效应（*ripple effects*），在几百万、几十亿和几万亿年的时间里，这些涟漪效应会累积成重大的东西。

贝克斯特德观点的一个含义是，引用他的话说，由于“在穷国拯救生命可能比在富国拯救和改善生命的涟漪效应要小得多，..... 现在在我看来合理的是，其它条件是一样的话，在富国拯救一条生命比在穷国拯救一条生命在实质上要重要得多。”

尼克·贝克斯特德建议，“在其它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在富国拯救一条生命比在穷国拯救一条生命在实质上要重要得多。”。

究竟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较富裕的国家有更多的创新，它们的工人在经济上有更高的生产力。”这在长期主义者世界观中是讲得通的。正如希拉里·格里夫斯（Hilary Greaves）——汉森和麦卡斯基身边的另一位研究助理——在一次采访中指出，我们直觉般认为，将财富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是改善世界的最佳方式，但“长期主义的思想路线表明其它方法可能更好”，即，向相反方向转移财富（transferring wealth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威廉·麦卡斯基（**William MacAskill**）起初是因为鼓励年轻人在华尔街（Wall Street）或石化公司（petrochemical companies）工作，这样它们就可以赚更多的钱来做慈善（give to charity），而成名的。最近，他已经成为长期主义的海报男孩，这要归功于他的新书《我们对未来的责任》（“What We Owe the Future”），该书旨在成为类似于长期主义圣经（the Longtermist Bible）的东西，列出了长期主义宗教的各种戒律和信条（the various commandments and creeds of the longtermist religion）。

在2021年，麦卡斯基为这样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对长期的关心（caring about the long term）应该是决定当前如何行动的那关键因素（*the key factor*）。在判断我们行动的价值时，我们不应考虑其即刻影响（immediate effects），而应考虑其从现在起一百年甚至一千年后的影响。我们今天应该帮助穷人吗？那些遭受气候变化而破坏性影响的人，且这气候变化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尤为严重？不，我们决不能让我们的情绪（emotions）控制我们（get the best of us）：相反，我们应该遵循数字，且数字清楚地暗示（imply），确保 10^{45} 个数字人（digital people）的出生——这是麦卡斯基使用的数字——必须成为我们的优先事项。

虽然13亿人遭受痛苦非常糟糕，但麦卡斯基会承认（admit），13亿人和 10^{45} 人之间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有哪怕是微小的机会（a *tiny chance*），即一个人的行动会帮助创造这些数字人，那么这个行动的预期价值（the *expected value*）可能远远大于帮助今天生活和痛苦的人（those living and suffering today）的预期价值。在这种观点中，道德（morality）就是要计算数字（crunching the numbers）；正如长期学者埃利泽·尤德考夫斯基（Eliezer Yudkowsky）曾经说过的那样，“乖乖闭嘴，然后进行乘法（multiply）”。

在他的新书中，麦卡斯基采取了一种略微温和的方法。他现在认为，关注遥远未来（the far future），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那关键优先事项（*the key priority*），而是一个关键优先事项（*a key priority*）。但这一举动，即从定冠词到不定冠词（the definite to the indefinite article）的转换，仍然产生了一些相当令人不安的结论。例如，麦卡斯基声称，从长期主义角度来看（a longtermist perspective），我们应该更担心人口不足（*underpopulation*）而不是人口过剩（*overpopulation*），因为人口越多，技术“进步”（technological “progress”）就越多。现在的趋势表明，全球人口可能开始下降，在麦卡斯基看来，这将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然而，麦卡斯基看到了一个出路，他认为我们可能不需要创造更多的人类来保持进步的引擎（the engines of progress）轰鸣。相反，我们可以“开发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它可以取代人类工人（human workers）——包括研究人员。这将使我们能够增加从事研发工作（R & D）的‘人’的数量，就跟我们目前扩大最新款 iPhone 的生产规模那样一样容易。”毕竟，这些 AGI 工人（AGI worker-people）可以很容易地被复制（duplicated）——就像你可以复制一个 Word 文档那样的方式——以产出更多的工

人，每个工人，都像研究和开发新产品那样快乐，来劳累工作着（toiling away）。麦卡斯基继续说：

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的进步可以提供另一种重启发展（rebooting growth）的途径。如果具有爱因斯坦水平的研究能力（Einstein-level research abilities）的科学家被克隆出来，并从幼年开始接受训练，或者如果人类被基因工程改造（genetically engineered）以具有更强的研究能力，这可以弥补总体上较少的人，从而维持技术进步。

正如杰里米·弗洛雷斯（Jeremy Flores）在推特上写道，“你几乎可以看到试管（test tubes）中的婴儿爱因斯坦——连同髭须和蓬乱的白发（complete with mustaches and unkempt gray hair）！”

但是，也许麦卡斯基最令人深刻的主张（most stunning claim）是我们应该停止通过燃烧煤炭和石油（burning coal and oil）来污染我们美丽的星球的原因（the reason），这原因是如果我们的工业文明崩溃，我们可能需要这些化石燃料（fossil fuels）来重建我们的工业文明（rebuild our industrial civilization）。我将让麦卡斯基解释这个想法：

燃烧化石燃料会产生一个气候更暖的世界（a warmer world），而这可能使文明恢复（civilisational recovery）变得更加困难。但是，这也可能仅仅是因为使用了一种不可再生资源（a nonrenewable resource）而使文明恢复变得更加困难，而这种不可再生资源，从历史上看，似乎是工业化的关键燃料（a critical fuel for industrialisation）。..... 由于从历史上看，使用化石燃料几乎是工业化的铁律（an iron law of industrialisation），因此，化石燃料的枯竭（the depletion of fossil fuels）是似乎有可能（plausible）会阻碍（hobble）我们从崩溃中进行恢复的尝试。

换句话说，从长期主义角度来看，我们不应该烧掉今天 (*today*) 所有的化石燃料，因为我们在之后 (*later on*) 可能需要烧掉一些以便进行重建，用剩下的煤和石油来经过 (*pass through*) 另一次工业革命，并且最终恢复我们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这是麦卡斯基，在以前，就多次提出的一个论点。

从长期主义角度来看，我们不应该烧掉今天 (*today*) 所有的化石燃料，因为我们可能以后 (*later*) 需要烧掉它们，以便经过另一次工业革命，并最终恢复我们现有的技术发展水平。

请反思一下工业化已给地球带来的危害。我们正处于在地球上38亿年生命历史中的第六次大规模灭绝 (sixth major mass extinction) 的早期阶段。全球野生脊椎动物 (*wild vertebrates*) ——哺乳动物、鱼类、爬行动物、鸟类、两栖动物 (*mammals, fish, reptiles, birds, amphibians*) ——的数量在1970年至2014年期间减少了令人难以置信的60%。由于污染，我们的海洋存在着巨大的“死亡地带 (dead zones)”。对我们星球的气候预测的标记是：特大干旱 (*mega-droughts*)、大规模野火 (*massive wildfires*)、冰川融化 (*melting glaciers*)、海平面上升 (*sea-level rise*)、更多的物种灭绝、主要生态系统的崩溃、大规模集体迁移 (*mass migrations*)、前所未有的饥荒、超过95度湿球温度这一可生存性阈值的热浪 (*heat waves above the 95-degree wet-bulb threshold of survivability*)、政治不稳定 (*political instability*)、社会动荡 (*social upheaval*)、经济破坏 (*economic disruptions*)、战争和恐怖主义、以及等等。我们的工业文明本身 (*itself*) 可能因为这些环境灾难而崩溃。麦卡斯基认为，如果“文明重启”按钮被按下，我们应该重新再做一次 (*do it all over again*) 。

他为什么要这么认为？如果你还记得他先前声称的在庞大的计算机模拟中且分布于整个银河系遍地的 10^{45} 个人，那么你已经为你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山姆·班克曼-弗里德 (Sam Bankman-Fried) 是一位身家数十亿美元的长期主义者，他创立了FTX，这是一家加密货币交易所 (a cryptocurrency exchange)，其首席执行官是尼克·贝克斯特德 (Nick Beckstead)。加密货币是一个庞氏骗局吗 (Is cryptocurrency a Ponzi scheme?)？根据班克曼-弗里德对去中心化金融 (Decentralized Finance) (DeFi) 的描述，它听起来确实是如此。他最近声称，“按照庞氏骗局的数量，加密货币中的庞氏骗局，人均意义上 (kinda per capita)，比其它地方的庞氏骗局要多得多”，尽管他不认为这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因为“它只是像数量众多的各种极小的庞氏骗局 (it's just like a ton of extremely small ones)。”不过，这是否使它稍微好点？正如博斯特罗姆的前同事大卫·皮尔斯 (David Pearce) 去年在一个社交媒体上问道，该帖子链接到一篇关于班克曼-弗里德的交易 (Bankman-Fried's dealings) 的文章，“有效利他主义者 (effective altruists) 应该参与庞氏骗局吗？”

班克曼-弗里德有重塑美国政治，以符合长期主义者议程，的大计划。今年早些时候，他资助了卡里克·弗林 (Carrick Flynn) 的国会竞选活动 (the congressional campaign)，弗林是人类未来研究所的一名长期主义研究成员 (research affiliate)，他的竞选活动由同样在人类未来研究所工作的阿维塔·巴尔维特 (Avital Balwit) 管理。弗林从班克曼-弗里德那里得到了“创纪录的1200万美元”，班克曼-弗里德说他可能“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花费10亿美元或更多，这将使他轻松成为有史以来单一选举中最大的政治捐助者 (political donor) ”。

(弗林在俄勒冈州第六区的民主党提名竞选中败下阵来；这1200万美元只为他赢得了11000多张选票)。

鉴于班克曼-弗里德对政治的兴趣，我们应该预计看到长期主义在未来几年变得越来越显眼。虽然弗林将长期主义带入美国国会大厦（the U.S. Capitol）的竞选活动虽然失败了，但这只是开始。这会儿，想象一下，有一个长期主义者总统。或者想象一下，长期主义成为一个新政党的驱动意识形态（the driving ideology），该政党在国会中获得多数席位，并投票于支持（aligned with）博斯特罗姆的居于模拟中的数字人的愿景（Bostrom's vision of digital people in simulations）的政策，或汉森关于由狩猎-采集者居住的地下掩体的建议，或麦卡斯基关于气候变化的观点。事实上，正如最近的一篇联合国快讯文章（UN Dispatch article）所指出的，联合国本身已经正在成为长期主义者社群的一个分部（an arm of the longtermist community）：

整个外交政策界（the foreign policy community），特别是联合国，正开始拥抱长期主义。明年，在2023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开幕式（the opening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上，秘书长（the Secretary General）将主持他所说的未来峰会（a Summit of the Future），以将这些想法带到在联合国的辩论的中心。

这一点在该文章的链接中的对麦卡斯基的播客采访中得到了证实（driven home）。根据麦卡斯基的说法，即将举行的峰会可以帮助长期主义意识形态“主流化”，为它做的事情就像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Earth Day）”为环境运动（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做的那样。那么，想象一下，一个，长期主义——本文上面讨论的各种想法——变得像今天的环保主义（environmentalism）一样普遍和有影响力，的世界。班克曼-弗里德和其它人所希望着的正是这种结果。

这只是对，产生长期主义的社群以及与之相关的人所拥抱的一些中心思想，的一个简要介绍（a brief snapshot）。长期主义社群不仅是一个，那些担心“劣生压力（dysgenic

pressures) ”作为一种存在风险 (being an existential risk)、支持“男权”运动、靠庞氏骗局发财以及对人口不足和气候变化发表离谱言论 (outrageous statements) 的人, 的舒适家园 (a welcoming home), 而且它似乎很少努力促进多样性 (foster diversity) 或研究调查对未来的其它愿景 (alternative visions of the future), 这些愿景不是建立在全球北方白人男子的特权视角上的, 培根主义式的、支持资本主义的炽热之梦 (Baconian, pro-capitalist fever-dreams)。事实上, 根据一个对有效利他主义社群的2020年调查, 其76%的成员是白人, 71%是男性 (male), 我怀疑这一人口统计特征概况 (a demographic profile) 在未来不太可能改变, 即使长期主义在地球村 (the global village) 成为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通过了解长期主义在过去20年中进行发展的社会环境 (the social milieu), 人们可以开始看到长期主义者是如何最终形成它们现在正在向世界传教 (evangelizing) 的怪异、狂热的世界观 (the bizarre, fanatical worldview) 的。人们可以开始明白为什么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是长期主义的粉丝, 或者为什么主要的“新无神论者”山姆·哈里斯 (leading "new atheist" Sam Harris) 为麦卡斯基的书做了热情的大肆宣传 (enthusiastic blurb)。正如我在其它地方所指出的, 哈里斯是“西方文明 (Western civilization)”的坚定捍卫者, 其认为“我们正在与伊斯兰教开战”, 并已经对查尔斯·莫瑞 (Charles Murray) 的种族科学做了宣传——其中包括着因为基因进化 (genetic evolution), 黑人的智慧不如白人的论点——并迎合巴结了道格拉斯·默里 (Douglas Murray) 这样的极右派人物, 道格拉斯·默里的著作包括《欧洲的奇怪死亡: 移民、身份、伊斯兰》 (“The Strange Death of Europe: Immigration, Identity, Islam”)。

这些人如此相信长期主义的类宗教世界观是意料之中的, 根据这种世界观, 西方是人类发展的顶峰 (the pinnacle of human development), 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更多的

技术，而道德则被简化成（reduced to）一种计算练习（a computational exercise）（“闭嘴然后做乘法”！）。当麦卡斯基隐晦地问道“我们欠未来什么/我们对未来的责任是什么？

（What do we owe the future?）”时，人们必须琢磨他在谈论谁的未来（*whose future*）。本土土著人民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igenous peoples）？世界上近20亿的穆斯林的未來？全球南方的未来？环境、生态系统和我们在地球上的活生生的生物伙伴（fellow living creatures）的未来？我想我不需要为你回答这些问题。

如果长期主义者所设想的未来反映了这一运动在过去20年中所培养的社群，那么谁会真的想要生活在其中呢？

爱弥儿·P·托雷斯（**Émile P. Torres**）是一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其工作关注于对文明和人类（humanity）的存在威胁（existential threats）。TA（they）的出版文章涵盖广泛主题，包括机器超级智能（machine superintelligence）、新兴技术（emerging technologies）、和宗教末世论（religious eschatology），以及关于人类灭绝的历史和伦理（the history and ethics of human extinction）。TA即将出版的书是《人类灭绝：关于湮灭之科学和湮灭之伦理的历史》（劳特利奇出版社）（“Human Extinction: A History of the Science and Ethics of Annihilation”）（Routledge）。更多信息，请访问TA的[网站](#)并在[推特（Twitter）](#)上关注TA。